

后门口(两章)

冯光辉

超市后门口

每个超市都有没卖完的菜扔专门的垃圾桶。这个超市也不例外。就有一些人如鸟般栖息于此,挑拣自己觉得合适的菜。

今遇穿着整洁的二人。甲说这么多好菜,扔了可惜,就这菜边皮,洗净切碎添加猪油渣,包馄饨,啧啧,舌头不鲜出半寸来你找我。

乙说现在菜太贵,超市又讲究个菜新鲜,瞧这菠菜,瞧这生菜,瞧这……这是玉米衣,我以为是包菜叶。这些不都蛮好的啊,能节约就节约点,我们老两口省点,孩子可以减轻点负担。

甲说我们这一辈是牛马命,还好。现在的年轻人不光是牛马命,还要加上松鼠命,走一步看四方,吸口气都要看看朝哪里吐气的,生怕一口浊气吐老板腰上。你看小区门口,早上最先出门的是年轻人,一个个像老鼠骑着电动车窜出去,我们吃完晚饭纳凉,你再看看他们,像一根根晒瘪了的黄瓜,挂在回家的电动车上,可怜到则。他们攀枝怕鹰,下树怕兽,只能围树转,有果吃一颗,没果趴洞啃老树,压力太大了。

我远远偷拍两张他俩的背影便走近,背对他俩,耳朵却记录着对话。

他俩都是上了年纪的人。青春期的理想总不是有垃圾桶的生活片段吧?不,可能我错了,他俩的童年或许就是靠着父辈捡拾菜边皮之类的方式活过来的。要不怎会对垃圾桶如此驾轻就熟呢?

人最重要的是认识自我。这个自我的认识还要及时,对生存环境、对自身能力的及时认识。其实他俩并没有越出正常人的行为界限,而是熟练地温习着人的本能动作。

起初,我还猜想他俩是不是本小区的?家里还有谁?其实他俩是

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俩不时发出欢笑,一人围着一个垃圾桶,像是翻垦着自家的田地,其场景着实感染人。我不时回身瞅一眼,他俩根本不在乎超市门口的人流。此刻倒是我觉得自己很龌龊,借着法子来偷听他俩的对话,好奇他俩正在发生的行为,然后去拼凑自己的文字。

关注民众,关注生活,谁说的?肯定是一个领袖在窑洞里说过的。

超市内的一元区和超市外的垃圾桶,是插在人间烟火里的温度计。有刻度。

小区后门口

小区后门口的老头群,骂骂咧咧说这几天的最高气温不止在三十七八度,只有西南没有风,热煞。他们在骂声中说的天气预报,好像比有科学态度的气象预报都准。

太阳底下没有风,显热。树荫下是个好去处。

我去买菜路上必经过他们。这里是小区的后门口,有一石榴大树。

后门也仅是容膝之地,又逢上班时,我一朽木老头得让着匆匆骑电动车的为生活而忙碌的年轻人。

此时我立一边,又听老头群言:“这个天气怎么没风呢?”高速路上的汽车,开到120迈,耳边就呼呼生风。凉快。我昨晚问儿:“地球1700迈,我们坐在后门口,怎么不生风不凉快呢?”

“那明早礼拜天,你去人民公园,问他们。”

“哎,好佬,他们什么都懂。”听对话,好情趣呢。细微的人间欢乐都会分我好几天的欢乐。我欢乐库里储存的乐,多。

有端茶杯的老头驻扎的地方,肯定有天真之心、成熟之道,也肯定有天下新闻、地上奇闻。

精彩书摘



三是求真爱国,勇于献身。

近代出版业不仅仅是实业,更是时代政治的感应器。近代中国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人士,都以出版活动来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政治立言”,为改造社会制造舆论。在近代中国,几乎所有政治事

他们创造了无数的第一

——常州出版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意义

叶舟

件都可以从出版活动中找到踪迹,而能否顺应社会变革往往成为出版业进步与否的政治标尺。而以出版救国,更是中国人自办出版业的一种重要的促因。在这种大环境下,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兴办教育和编译书报的重要性、紧迫性。从李伯元开始,陈范、狄平子、蒋维乔、庄俞、恽铁樵等一大批既有着深厚旧学功底,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文人,怀着治国安邦、开明民智的热忱投身出版业。他们不仅认识到知识更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体会到文化传承对于民族延续的重要性,并从这个高度出发,高屋建瓴地布局、规划文化生产。他们从事教科书、辞典的编纂,主要在放眼看民智的教化与国民性的建设,为现代教育在中国扎根和普及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他们刊印传统文化典籍和书画作品则立足于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存续与延展,为文化传承立下了不世之功。他们不仅为近代出版业注

入了文化的清泉,他们的学术底蕴与深厚功力更确保了出版物的质量,他们带给中国出版业的不仅是丰厚的文化资源,更是一种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文化胸怀。

更有一批常州出版人继续以天下为己任,寻找为生民托命的方向。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士人“内圣外王”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又发展出列强侵略下救亡图存的政治觉悟,他们几经探索,从维新到革命,最终选择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崇高的信仰,将“少数人”的文化自觉化身为最大多数人的文化自觉,最终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出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出版工作和中国共产党一同诞生,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为使命,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加深了普通大众对共产党的了解,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近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出版群体,像常州那样,贡献出如此之多的红色出版人。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初心之心投入到出版事业中,将生命置之度外,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与追求,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光照着后人。徐伯昕、李公朴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人,作为进步革命出版人,他们也自觉将出版事业视作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解放运动中。在这些革命出版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党性原则、党性觉悟,以及求真精神、忘我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出版人牢记使命,成为红色文化的践行者、传播者、见证者。

有学者曾言:“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能独立,要求在外围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而这两个问题在出版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在这样一个转变的历程中,近代出版业在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如社会参与、价值表达、思想传播、知识扩散、文化阐发等诸多方面,都成为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如当时人明言的“风气之变迁,学术之进退,固于是可见其略焉”。常州的一批怀抱济世情怀、互相砥砺志节的文化精英,面对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缘际会,投身到这一行业中。他们身上洋溢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有着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怀,坚持个人良知和道德风骨,充满了自奋求变和改革创新的精神,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间接或直接地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历程。他们的这份努力,这份热忱,这份贡献,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其意义,他们的名字,我们不应该遗忘。而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全文完)

(本文选自《播种者——中国近代出版业中的常州人》,题目为编者所加)



方塘悦色 (摄影) 陈亮

一封来信

阿雅

我在家整理橱柜时,翻到一封来信。

我写给爸爸的信。信封背面,爸爸的字跃然纸上:91年元月28号收到。爸爸的字,整齐清秀。我的字,远不如爸爸。哥哥说我的字是鸡爪。

91年——上个世纪1991年,我刚参加工作3年,刚二十出头,恰青春正当时。有点记不清当时的模样,那时照片还是稀罕物。我的头发应该还是短的。读书时,我一直是短发。91年,我的头发应该还没留长,还是假小子模样。

见到爸爸的字,好亲切。爸爸又笑眯眯的在我眼前了。

爸爸做事细致有头尾,从信封上标注收信日期,可窥一斑。

爸爸生前在学校,一直任总务主任。教育局局长视察学校,说爸爸管理的仓库,比人家房间都整洁。爸爸退休后,侍弄自留地,买种子施肥除草,都有时间记载。爸爸有一本记录簿,都是记的农事诸事时间始末。

我给爸爸的信,首先告诉爸爸,老校长借用到民政局、教导位置变动等学校人事变化情况。

我进特校,是老校长“要”过去的,是“盲”进特校。当时特校叫聋哑学校,收的都是聋哑学生。我完全不了解当时聋哑学校的情况,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学生,更不知道要学手语懂手语,竟然就答应了老校长,撞入了特殊学校的大门。想来真是傻大胆。

就是这个盲目的举动,决定了这辈子的职业生涯,也可称之为命运吧。

误打误撞,倒是走进另一个世界,看到另一个天地。生而为人,有人完整有人不完整,有人完满有人不完满。可完整完满,界限又在哪儿?天地万物,幸与不幸,有了比较,认知才更清晰。

老校长是个兢兢业业的瘦小老太太,早到校晚回家,直把学生当自己孩子。据说她爱人离世时,她还在为学校的事情奔波,与爱人

的最后一面没能见上。老校长应该是“劳模”“三八红旗手”(有些模糊了),这样的奖赏,老校长完全配得。最佩服老校长,自学手语,用手语表达,流畅自然,与聋哑学生交流,毫无障碍。老校长借用到民政局,其中有项工作,就是做手语翻译。

信中告诉爸爸,镇上成立书画协会分会,我也参会,正在加紧准备作品。

若不看信,都忘记那些年,自己也曾往返城里学国画,还被老师说“构图有大将风范”。自己没耐心练字,最终“大将风范”没见,连这一爱好也束之高阁,直至完全遗忘曾做的这些事。

信中还告诉爸爸要练舞参赛,还想拿奖金,好像奖金等着自己拿。青春无畏。

信末尾还有一喜事:友雅2月5号结婚。

“我一定会赶回家参加婚礼。”我这么对爸爸说。“赶回家”,显得自己很忙的样子。忙什么?忙作画参展,忙练舞比赛,忙单位琐事……

年轻,什么都想做,有大把好时光可以挥霍。什么都急吼吼。回头看,什么都没做成。

1991年2月5号,阴历是年底。那天天气有点阴沉,友雅对自己的婚姻,因一些原因,不太满意,就为给爸妈一个交代。那天雅没有新娘的喜悦。一直记得她淡淡的面容,坐在妈妈家房里,垂眸,不大言语,听之任之。转眼,30多年过去,雅已做了婆婆。不知雅还记得她出嫁那天的事,她垂眸坐房里,不喜不悲的情状,我一直记得,也曾为她担忧过。

……文字真好,可以记录,复原往昔。若不是这封信,这些事或忘记、或尘封,哪还有这些场景出现?

我可是懒于码字的,前尘往事,不知多少已埋没,再找不回来。

爸爸的回信也找不到了。

找不到的,又何止是爸爸的信?

娟子来到世间,纯属意外。娟子说,她来到世间投奔父母,是来报恩的。

那年,娟子的母亲已42岁了,此前没生育过,父亲陪同母亲遍访名医治不孕不育症,都没效果。娟子的父亲,是一个没啥锋芒的老好人,喜欢照顾别人的情绪与感受,说话时总是顺着别人的语气,“嗯、嗯、嗯”“是啊,是啊”,是父亲的口头禅。面对母亲,父亲首先放弃了:“要不,我们这辈子就不要孩子吧,嗯。”但这伤了一个女人的心,一个女人,这辈子没成为一个母亲,总是不完整的人生。母亲其实知道,父亲喜欢孩子,每当望着街巷楼院里的孩子,从父亲那怔怔的目光里,就可以看出他心里饱含的期盼。

从天津求医回到县城的那个春天,母亲突然怀孕了。县城的河流上空,“嘎噜噜”飞起一群水鸟,这是报告一个家庭的喜讯。

当父亲从医院抱着襁褓里的娟子回到家,“扑通”一声跪在一个面色严肃的男人照片面前:“爸爸,您当爷爷了……”黑白照片上那人,是娟子的爷爷,53岁那年就早早离世了。

娟子确实是来报恩的。从小到大,她很少让父母操心。小学到高中,一路成绩优秀,每逢开家长会,就成为班主任老师口中夸耀的学生。

娟子18岁那年夏天,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大学毕业,娟子又在某校读了研究生,尔后进入北京一家著名的国企工作。26岁,娟子开始恋

爱,小伙子来自内蒙古,性情热烈,为人豪爽。小伙子第一次带娟子去看内蒙古的大草原,天蓝得仿佛要融化,草原上的牛羊缓缓流动,草原上空下,娟子便把一颗心许给了小伙子。

娟子28岁那年秋天在北京结婚,房子是按揭买下的。不过这一次父亲有些急了,他给内蒙古的亲家打电话,说住的房子欠钱,心里还是不踏实,我们两亲家共同想想办法吧。亲家也大度,他们就一个儿子,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最后不就是给儿子么。于是,两户人家筹集了200多万元,把欠下的房贷还清了。父亲给娟子打去电话,语气轻松愉快:“娟儿啊,而今爸爸在县城睡觉也踏实了,这人一辈子啊,不要欠人家的钱。”“谢谢爸爸!”娟子在电话里说,她突然觉得,在北京的灯火下,这房子墙壁里的每一块砖,都浸透着亲人的温度。

结婚后的每年春节,娟子都要带上丈夫回到内蒙古与自己老家的县城过春节。在故乡老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那种埋进骨子里的年味才会蹿到血液中来。后来,有了女儿,家人团坐在县城,喜悦会荡漾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重返县城的生活

世勇

有年春节,娟子把父母接到北京过年。父亲母亲呆呆地坐在房子里,恍惚是突然失聪了,那感觉是把两棵老树从县城硬生生移栽到了北京。正月初四,娟子就带着父母乘飞机到了省城,然后换乘高铁回了县城。回到县城的父母,仿佛两株枯萎的植物遇到了雨水,转瞬之间就枝叶青翠透亮了。

娟子同丈夫商量过,等父母老了,老得走不动了,最终还是要到北京照料,让父母过上体面的晚年生活。

去年春节,娟子带上丈夫和女儿回到县城父母的家,8岁的女儿甜甜地呼唤“外婆,外婆”,但母亲似乎无动于衷,毫无反应。这令娟子感到吃惊不已。

父亲平静地拿出医院的检查片子,告诉她,母亲严重脑萎缩,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爸爸,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娟子冲着父亲大声说。“告诉你又有啥用,这个病也治不好的,不过我身体还不错,会把你妈妈照顾好的。”父亲说。

面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母亲,娟子悄悄地哭了。离开县城的头天晚上,娟子扶着母亲,给她洗了一次澡。母亲松地耷拉的皮囊,如老鼓颤动的

皮。也是第一次,娟子看见母亲肚皮上有一道深深如蚯蚓窜动的疤痕,那是母亲当年剖腹产后留下的。

回到北京的芳菲四月,娟子和丈夫作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全家人回到县城,照顾父母的生活。娟子明白,无论如何努力,父母不会来北京居住,父亲还说,已经做好了去养老院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打算。

娟子作出的决定,对父亲来说,无异于石破天惊。但这一次,娟子是铁了心。她说:“爸爸,不要劝我了,我喜欢县城热气腾腾的生活,我喜欢与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去年秋天,娟子辞职,与丈夫女儿回到了县城生活。而今,娟子与丈夫在县城开办了一家传媒公司。

在县城,盘根错节的关系串在一起,几乎人人之间都是亲戚了。县城的生活,给娟子的内心带来平和宁静。在县城,可以望见地平线,还有明月与星空。

我去娟子家做客的那个傍晚,夜风清凉,娟子正在给母亲喂青菜瘦肉粥,丈夫辅导着女儿做作业。一旁,一生温良恭俭让的父亲,嘴角浮笑,慈爱地望着他在那尘世陷入记忆沼泽里的爱妻。